

共匪「三面紅旗」的失敗

共匪於四十六年冬，四十七年春發動以積肥、水利、深耕翻土爲中心的農業「大躍進」；四十七年五月間，匪黨「八大二次會議」又宣佈「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八月間，「大躍進」由農業導入工業，並同時瘋狂推動「人民公社」和「全民皆兵」的「民兵」制。因此，共匪自四十八年起稱「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爲「三面紅旗」，並不是預期的事，而是後來臨時瞎湊而成。共匪心目中，三者間的關係如此：「總路線」是這一階段總的政策和方針，「大躍進」是爲了「生產力」的發展，「人民公社」在求「生產關係」的變革。實質上，這「三面紅旗」無非是加緊動員大陸人力、財力和物力，爲改善地區間的戰略部署，建立一個比較堅實的戰爭面而努力。

但是，事實上三年多來的發展，並沒有使這三項暴政成爲共匪真正的「紅旗」，却帶來了最嚴重的損失。這種損失不祇是經濟的，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蒙受的挫折，民怨沸騰，造成對共匪愈來愈不利的惡劣形勢。

一 「總路線」的崩潰

先就「總路線」而論，共匪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內容，就是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爲目標，「社會主義工業化」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加強現代化的軍事力量。曾匪文經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一書中稱：

「我們深信，發展我強大重工業的願望是可以實現的，而當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化取得每一重大步驟的勝利之後，我國的

國防就越來越鞏固起來。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獲得全部成功之後，我們就要成爲矗立在太平洋西岸上的鋼鐵般的巨人了，任何外來的威脅都不必顧慮了。粗略地計算一下吧，我們在完成三個五年計劃後，主要的重工業產品的產量（石油除外）就可以超過蘇聯在一九四〇年的產量。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就依靠這一工業基礎來把最強有力的帝國主義國家——希特勒德國——打敗。我國在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之後，既然擁有比一九四〇年蘇聯更大的工業基礎，又擁有特別廣衆的人口，再加上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工業上和軍事上的互相呼應和援助，那麼，它的國防實力的強大，就可想而知了。」（該書第五十四—五十六頁）

這一段話，說明「總路線」的侵略贖武主義的實質，說明共匪如何在「工業化」的面紗之後，積極從事準備戰爭的活動。

「總路線」的實質如此，但在實行過程中，却遭遇許多客觀因素的阻礙，匪幫內部緩進、急進兩派的拉鋸戰，使「總路線」失去了應該是在相處長的時間內，必須有穩定的目標與方針，而在忽左、忽右的混亂和摸索中過去。舉例說，「過渡時期總路線」公佈之初，力主「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工業爲基礎」。試行不及五年，困難與弊端叢生。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公佈時，不得不改唱「五並舉」，兼顧農、輕、重工業、中央與地方工業、大型與中小型企業，土法與洋法生產。實行又不及兩年，始知其農業已無力支持工業化，四十九年起，又不得不改爲「以發展農業爲基礎」的原則。去年三月三十日僞「二屆人代會二次會議」，更正式宣佈「以

農業爲基礎，以工業爲主導」的方針；以後，又不斷呼籲「大辦農業」。今年初，更大聲疾呼：「必須集中力量，加強農業發展」。把「總路線」的方針完全倒轉過來，一變而爲優先發展農業。我們姑不深究它的重工輕農，或是輕工重農的具體內容，以及它如何全力支持農業發展，企圖迂迴的達到戰力成長的目的等等，但我們在其政策、方針的搖擺、轉變和混亂中，可以充分知道：「總路線」實際上已完全崩潰。

二 「大躍進」的退縮

共匪「大躍進」是在「一窮二白」的基本情況下產生的玩意。中國大陸無論資本、機器設備和技術都異常缺乏，共匪所掌握的祇是龐大的人力資源。因此，就襲用「搞羣衆運動」的方式，利用這衆多人力。「全民煉鋼」、「全民辦工業」、「全民辦交通」……，以及實行「小、土、羣」生產，重點祇在「全民」和「羣」字上。在共匪的構想，人口可以變成人手，衆多的人力可以變爲資本和各種形式的財富。其實，共匪「大躍進」所作所爲，今日驅羣衆煉鋼，明日又要求「全民辦交通」，繼而又要求「全民辦糧食」，很類似原始式的遊牧。而且它們想法實現的可能性關鍵更在於人們的意志與情緒如何，人們願否不計報酬地工作，願否夜以繼日的忍受折磨，願否放棄選擇而從事強迫指定的苦役。

三年來的事實，證明了大陸人民從不甘願接受匪幫的愚弄與役使，「大躍進」祇是共匪的誇張宣傳，我們可以兩件事爲例：其一，是「大煉鋼」。四十七年八月以後，以短短三、四個月時間驅迫人民建成六十餘萬座土高爐，結果這些土高爐因爲煉不出好鐵，甚至煉不出鐵、煉出的鐵含硫、磷質太多，變成廢物，或者遠離原料和燃料產地，或者化用原料過多，太不經濟，不得不大批棄置、折併

、停用，縮減爲六百多個小高爐點。因而浪費大批人工，白白化費鉅量財力與物力。其中僅勞動力一項，最初三個月時間足足花去約六十億個勞動日，工傷及勞累與燙灼致死的人數，統計在兩百萬人左右。

第二個例子是糧食生產。四十七年共匪第一次宣佈糧食產量爲七千五百億斤，爲四十六年的一倍。次年共匪自己承認統計的浮誇、粗率，降低了三分之一，核實爲五千億斤。實際上，這一產量仍然誇大。這說明「大躍進」第一年，祇撒了一個大謊。四十八年，原計劃產量是一萬零五百億斤，企圖比四十七年增加三千億斤，後來竟改爲五千四百億斤，事後公佈執行產量爲五千四百零一億斤，顯然這也是虛報的數字。根據我們的估計，四十八年的糧食產量約爲三千九百億斤。四十九年的糧食產量據周匪恩來透露，約與四十八年相等，即三千九百億斤，不及「大躍進」的第一年（四十七年），而僅超過四十六年的產量，已造成舉世皆知的大飢饉。

這兩個例子已充分暴露匪幹的愚昧無知，政策的狂妄錯亂，驅迫人民的殘酷兇惡。而且這兩件事具有代表性，因爲共匪大唱「以鋼爲綱」、「以糧爲綱」，鋼、糧是其全盤經濟的「主帥」。鋼、糧生產尚且如此，其他更可想見。所以共匪「大躍進」帶來的不是經濟發展，生活改進，而是經濟萎縮，貧困飢餓，全面破產。

三 「人民公社」制的挫折

共匪自四十七年八月間開始實行之「人民公社」制，已經數度修改。四十七年八月北戴河會議前後，認「人民公社」是「共產主義社會萌芽性的組織」，各項措施，極爲激進，曾竭力設法使財產所有與經營管理，迅速集中，實行廣泛的供給制，縮短工資級距，顯示其「平均主義」的傾向。生產勞動方面，也盡量運用「大軍團

作戰」方式，殘酷役使農民，曾引起農民很大的怨憤。四十七年十二月武漢會議，共匪不得不在農民反抗的情勢之前，改變口吻，認為：「公社」不可能是「共產主義性質」的組織，不可過快進入「全民所有制」，經營管理不應過於集中，「生活集體化」尤其是公共食堂，宜「自願參加」，具有彈性，農民應有適當休息。共匪如此自打耳光的說法，實為對憤怒的農民一種戰術性的讓步。

此後，四十八年二月鄭州會議中，共匪更強調「人民公社」為基本上祇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是年八月廬山會議中，共匪宣佈「人民公社」經整頓後，財產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局部下放，改為以「生產隊一級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並實行生產小隊的「土地、農具、勞力、牲畜的「四固定」，工資則兼採評工記分辦法。四十九年，由於「公社」農民普遍反抗，消極拋荒，怠於耕作，忽於防災治害，因而糧食大歉收，造成大陸當前的大飢饉。共匪乃

剛果共和國之經濟現勢

一 社會治亂因素

剛果共和國自一九六〇年六月卅日宣告獨立後，七十五年來比利時之統治於焉告終。但其國內政局迄未統一安定，其原因自非一端：

(一) 剛果人知識程度不够，全國大學畢業者不及二十人。

(二) 獨立前未有充分準備，對於行政管理與政黨運用，缺少經驗與能力。

(三) 部族多至一百五十餘種，因爭中央參政權，相互對立。

(四) 剛果分為六省，省與中央之間又有權力之爭。

又強調：「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軟硬兼施，誘迫農民生產。並一再宣佈：不要因統一分配而減少農民原來的收入，工資部分一般地至少不能少於七成（即供給制的部分不得多於三成），勞動多和勞動好的社員可以得到較多收入，「生產大隊對生產隊不要管得太死」，「使生產隊也有一定的自主權」。共匪在農民日益熾烈的反抗前面，已不得不暫時緩和其對農民的進攻。我們深知：一方面，農民因於共匪嚴密組織與殘暴手段，雖不斷發生反抗事件，仍因缺乏外力援應，亦多以容忍換取一息苟延；另一方面，共匪鑒於農民孤軍苦鬥，不免疲困時，乃又再度進攻。共匪與農民間展開長期拔河式戰爭，在「公社」制推行以後，更為明顯，所以，從「公社」制的主要內容以及欺騙農民的方式等等的改變來看，「公社」制顯已遭遇農民的強烈抗拒，勢將成為共匪潰敗的主因。

(五) 非洲黑人與白人間歧視已久，獨立後，政權轉移，黑人急求洩憤報復。

(六) 俄共挑撥仇恨，煽動反殖民主義情緒，公開鼓動內亂。二次大戰以後，比利時政府當局鑒於民族主義潮流，對於剛果殖民地之統治，頗為開明。自一九五〇年起，即推行十年建設計劃，其目的在改良都市與農村之土人生活。在都市方面注重市街建築，使土人定居於都市，與白人逐漸融合，以擴大國內市場。在農村方面，更致力改善農業及衣、食、住之方法，使土人有較高之生產與生活水準。至一九五八年，其支出費用已達五百億法郎，超出原預算一倍。其用於基本建設者佔五〇·七%，用於社會建設者佔二